

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兴衰

——来自地级市层面的证据

刘海洋, 林令涛, 黄顺武

[摘要] 由于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强大影响力,政府官员变更可能会影响当地部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其中的影响机制有:政策不连续性、官员贪腐行为以及政企关系重新调整等。为此,本文收集了中国1999—2009年2000多任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数据,并与辖区内的企业匹配来识别地方官员对企业生存的影响。运用Kaplan-Meier乘积限估计方法绘制的生存函数和风险函数图显示,官员变更时企业的生存时间更短、倒闭风险更高。在此基础上运用生存分析模型进行更为精确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官员变更会显著增加企业的倒闭风险,并且这一风险存在多期滞后效应;但官员变更引致的退出风险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有所不同,其中,对国有企业、尤其是非中央国有企业的风险增加尤为明显;任期的稳定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并且任期对官员变更导致的风险有调节作用。本文还特别关注了官员自身特征对变更引致风险的影响,发现本地晋升的官员、在出生地任职的官员、学历水平较高的官员引致的企业倒闭风险较低。本研究为如何降低官员变更引发的企业经营风险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决策依据,同时为科学制定官员选拔和任用制度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地方官员; 企业; 生存分析

[中图分类号]F4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7)01-0062-19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创新能力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存在明显优势的情况下,经济却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地方官员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李维安和钱先航,2012;乔坤元,2013;罗党论和余满国,2015),因此,从地方官员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有助于理解中国的“增长奇迹”。然而,作为经济主体的微观企业,其生存时间却十分短暂(肖兴志等,2014;于娇等,2015),这与经济高速增长形

[收稿日期] 2016-11-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琼斯批评后研发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讨论及中国稳态增长路径构建”(批准号15BJL010);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批准号L11BJY007)。

[作者简介] 刘海洋(1978—),男,山东日照人,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副教授,经济学博士;林令涛(1990—),男,山东临沂人,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硕士研究生;黄顺武(1973—),男,安徽肥东人,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通讯作者:林令涛,电子邮箱:lineetao@163.com。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成鲜明对比。鉴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研究在中国特有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相结合的体制下,以追求晋升为目标的地方官员频繁变更是否加剧了辖区内企业倒闭的风险。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客观评估地方官员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力,同时为科学制定官员选拔和任用制度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依然对当地经济拥有很强的影响力。在中国经营企业,企业家往往不可避免地需要跟政府官员打交道。地方官员能够很大程度上控制辖区内的企业和各种资源(周黎安,2007),如土地使用、经营许可、政策优惠、监督检查、甚至银行贷款等,因而一旦政治环境变更,企业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一些地方政府领导频繁调动,任期不能届满的现象也比较普遍,这种官员频繁变更加剧了地方政策的不连续性,导致企业经营风险加剧。因此,本文提出的命题是,官员变更引发的政治环境变化可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生存。

为了估算这一影响,本文逐一搜集了中国1999—2009年2000多任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数据,然后找到这些官员所管辖的每一个企业,来识别地方官员对企业生存的影响。之所以提出这一思路,主要基于以下三点:①当前中国实行地方首长负责制,地方主要官员的更替往往意味着政策的不连续性,因而会在“关闭落后产能”、“减少环境污染”或者“产业升级”等口号下对先前重点发展的产业进行调整。在产业政策大幅调整下企业发展策略也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威胁企业的生存。②在中国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下,地方官员任期短暂,频繁调动催生了执政理念短视化。地方官员为追求晋升机会产生的短视行为将对当地企业形成过度干预,可能与企业本身的发展路径相背离,甚至增加企业退出风险。③官员变更也意味着政治权利的转移,政企关系往往重新洗牌(潘越等,2015),企业与本地官员建立的政治关系也一并打破,相当一部分企业的发展可能受到影响。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①在研究内容上,本文考察了政府官员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此前研究政府官员影响经济的论文主要是分析政府官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张平等,2012;宋凌云等,2013;杨海生等,2014)、经济增长速度对官员擢升的影响(徐现祥等,2007;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杨瑞龙等,2013)以及地方官员与投融资的关系(钱先航等,2011;曹春方等,2014;罗党论和余国满,2015),但研究政府官员与企业生存的文献非常匮乏,本文从地方官员变更视角研究地方政府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是一个全新的视角。②运用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和地方官员匹配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官员变更会显著引发企业的倒闭风险,但这一风险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对国有企业特别是非中央国有企业的风险增加尤为明显;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官员自身特征的影响,发现本地晋升的官员、在出生地任职的官员、学历水平较高的官员引致的企业倒闭风险较低,这一研究结果可以为降低官员变更引发的企业经营风险提供有力的决策依据。③为了精确估计地方官员变更对企业的影响,本文采用细化到企业层面的数据来控制所有制、企业规模等因素的作用;同时考虑到企业生灭问题的特殊性,即当研究周期结束时多数个体仍未退出市场,传统的估计模型无法准确识别这些特殊数据,因而本文用生存方法来解决这一数据缺失问题。

二、机制探讨:官员变更如何影响企业存续

在当前分权管理的体制之下,中国各级地方官员拥有非常大的对辖区内企业的管理权力,他们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促进出口、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政府官员变更如何影响企业的存续,现有研究并没有系统总结其作用机制。本文通过总结梳理,发现官员变更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条途径:

1. 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连续性可能导致企业异常倒闭

企业经营中往往涉及投资、购买机器设备、生产、销售等一系列过程,在经营过程中,企业家根据现有政策做出优化选择,因而政策的不连续性往往会使企业遭受之前意想不到的损失乃至倒闭。例如,上一届官员力图发展制造业,下一届官员可能想发展旅游业;上一届官员大力挖掘煤矿产业的潜力,下一任官员却可能想发展计算机等新兴产业,这种政策不连续会导致企业在生产、销售乃至信贷资金等方面都受到严重影响。当前已经有诸多研究,考察了政策的不连续给企业和经济带来的损失。例如,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稳定性会对企业投资支出、投资效率以及地区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Julio and Yook, 2012; 陈艳艳和罗党论, 2012; 杨海生等, 2014)。曹春方(2013)以及徐业坤等(2013)则进一步从微观投资的角度验证了官员变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向联系。贾倩等(2013)也有类似发现,而且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该官员管辖的国有企业,且上市公司的波动率也会显著提高。干春晖等(2015)发现,任期的第4—5年是地方官员晋升的关键时期,为了提高晋升概率,地方官员在该时期会提供较多的土地和融资优惠,造成企业扩张和产能过剩,而新任官员上任后对经济秩序的恢复,可能会通过淘汰落后产能等方式,直接导致企业的意外关闭。

2. 新上任官员的贪腐行为可能导致企业异常倒闭

虽然多数研究假定政府官员是无私的“社会决策者”角色,但在现实中这一假设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成立,即使在市场经济相对发达、法治环境相对成熟的国家依然存在。Shleifer and Vishny (1998)在论述政府的“掠夺之手”时发现,法国政府曾经要求将里昂信贷银行低价(1/4 价格)卖给总统的朋友。现实中这种“吃拿卡要”的例子也并非个例。吴海民(2013)则给出了一组更为详尽的数字,他发现民营企业在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吃拿卡要”之下支出的招待费占到企业毛利润的 20%,中国企业大约要花 11.4% 的时间来与各级政府组织打交道。姚金伟(2014)和杨其静(2010)论证了在政府固定投资抉择中掠夺之手的存在。潘越等(2015)发现,书记更替推动当地国有企业领导人非正常更替的可能性增加,通过随时更换议价能力更低的人选,地方官员对当地国有企业拥有更强的支配力,部分国有企业因此成为地方官员的小金库。但是,地方官员变更期间的腐败现象,很难进行直接统计。为此,本文考察了数据库中的管理费用一项,原因在于企业应酬费用在会计记账准则上属于该项费用。如果官员变更前后,企业的业务招待和对外应酬增加,则会在管理费用一项上有所反映。本文比较了官员变更与未变更地区企业的管理费用,发现前者普遍较高,其中 2000 年高出比例达到 34.36%, 2004 年则高出 10.66%。同时,本文使用的地级市官员数据还显示,离任后被发现贪腐行为的官员,在之前的任职中企业倒闭概率要比其他地区高 2.55%,也说明了贪腐行为对企业倒闭的影响不容小觑。

3. 官员变更可能切断部分企业的政治联系加速企业倒闭

许多垄断性企业依靠政府生存,因而官员变更可能会引发企业生存问题。戴园晨(2005)发现,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私人企业为了寻求政治安全感以及经济上的优惠,也会加强政企关系,但这些企业因为产权不清很容易导致新上任官员对企业的损害。罗党论和应千伟(2012)发现,政府官员到企业中视察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这种视察活动可以视为官员与企业之间建立政企关系的重要活动。当然这也意味着,政府官员变更代表政治权利转移,会使政企关系重新洗牌。因而潘越等(2015)考察了地方官员变更与国有企业的政企关系,发现官员尤其是外地官员的继任,会引发企业高管的变更,并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因此,官员变更之初,企业会通过种种渠道建立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曹春方和傅超(2015)运用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企业捐赠行为,他们发现企业捐赠与政府官员任期呈现显著的先增后减的“奇怪趋势”,原因在于官员任期内会追求社会慈善类的

形象工程,因而捐赠被企业当做一种与新任政府官员建立联系的桥梁,可见企业非常重视与地方官员建立政治联系。但需要说明的是,官员—企业关系重组,并不必然带来负面后果。离任官员的政治联系被切断,新任官员重建的政企关系可能更加健康/恶化,从而对本地企业生存产生有利/不利影响。但这与本文研究的主题也是相符的,因为本文考察的恰恰就是官员变更对当地企业的影响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地方官员对当地经济具有极强的影响力,有些官员甚至拍脑袋决策就可以让整个工业园区改造乃至搬迁,更遑论单个企业;有些地区换一届市长或书记,地方企业普遍感到经营压力增加。官员变更期间,当地企业尤其是那些与政府走得比较近的企业可能会发生倒闭风险,这种风险可能会因为政治联系重组导致部分企业陷入困境,也可能通过政策不连续性导致部分政策敏感型企业倒闭,还有可能因为官员贪腐行为导致企业发生风险,倒闭风险的变动幅度将在后文中刻画。

三、数据来源、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生存特征事实

1. 数据来源和基本处理

本文使用的企业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其统计对象涵盖了中国所有的国有企业以及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时间跨度为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是迄今为止可得的最全面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该数据包含了中国主要的制造业企业,代表了整个中国制造业总产出的90%左右,样本最为丰富,所以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的实证检验是基本能够反映现实的。邓子梁和陈岩(2013)、于娇等(2015)等采用该数据库对中国企业生存问题的研究也都得出了富有价值的发现。在进行分析前考虑到企业在样本期内发生重建、合并和收购等导致企业编码和名称发生变更的问题,参照Brandt et al.(2012)的处理方法对这些企业重新进行识别匹配,并在此基础上剔除工业企业数据中如下指标:①剔除从业人数少于8人的企业,因为大多数异常值来自那些没有可靠会计系统的个体户;②剔除缺少重要变量的企业和不符合一般会计准则的企业;③剔除销售额小于500万元的企业。

因为本文研究的是官员对企业生存影响的问题,首先参照Namini et al.(2013)的方法将生存时间定义为企业*i*出现于数据库中并持续至退出所经历的时间,当企业*i*在第*t*年存在而在第*t+1*年消失时即为退出市场^①。但在研究企业生存问题时两点需要说明:①如果企业在研究区间之前就已经存在,那么该企业自成立以来至本文进行样本观察期开始的生存状况未知,出现统计上的“左删失”问题;②如果企业在样本观察期结束时仍未退出市场,则出现“右删失”问题。本文选取1999年之后建立的企业,将样本限制在观察期内解决样本“左删失”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采用生存分析方法通过设定终止变量对含有“右删失”数据的样本进行估计提升估计效率。同时,考虑到存在数据间断的样本,仅保留在样本期内持续存在的企业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实际上,通过将研究时间起始点设定为1999年来解决“左删失”问题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企业倒闭最为严重的时期,可能发生在本文数据之前的20世纪90年代。例如,秦池酒业、巨人集团、三株、南德集团等都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典型的民营企业代表,均在20世纪90年代高速发

^① 按照该方法定义的企业生存时间,是指企业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样本存续时间,采用该测算方法是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当企业退出工业企业样本时,可能是因为企业经营状况恶化或者销售额低于500万的正常水平,本文认为该企业相比此前的经营状况变得相当困难,退出市场的风险已经很高,所以采用目前通用方法,以企业在样本中存续时间近似代表企业生存时间。

展,但大部分在 1999 年之前便陨落^①。20 世纪 90 年代的企业经营环境与现在相比有很大差异,企业的生存问题多是由企业经营思路不成熟、过分依赖广告策略、供应链管理不健全等企业自身原因导致的。而在 2000 年之后,这一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和法律体系有了很大改善,企业经营思路也发生了明显改变。采用该样本期的数据进行研究,对现在企业经营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经过上述方法处理后,本文共得到 1145620 个样本观测值,其中发生官员变更的企业样本有 168319 个观测值。本文所使用的样本在工业企业数据中也占有很高的比重(占 42.87%),说明数据样本的代表性较高。

地方官员变更数据是在中经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中国党政领导干部资料库和人民网公布的干部资料等权威媒体资源基础上,手动整理了中国各个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变更的数据。在处理区域问题时将直辖市中的县(区)归为地级市一级,该数据涵盖了 289 个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以及直辖市下的 83 个县(区)长和县(区)委书记的变更信息。另外,本文还通过统计年鉴、网络搜索等途径,对已有的数据进行补充。最终搜集到这些地区官员以下指标:上任时间、离任时间、学历、出生日期、籍贯、是否具有留学经历,并依据此刻画本文的官员个体特征。表 1 详细统计了 1999—2009 年每年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发生变更的情况,包括城市变更数量和变更频率。

表 1 官员发生变更的城市数据统计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市长	数量	58	76	116	107	155	78	72	99	150	135	54
	频率(%)	15.59	20.43	31.18	28.76	41.67	20.97	19.35	26.61	40.32	36.29	14.52
市委书记	数量	42	56	113	102	141	69	66	83	94	139	43
	频率(%)	11.29	15.05	30.38	27.42	37.90	18.55	17.74	22.32	25.27	37.37	11.56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由表 1 可以发现,1999—2009 年,地方官员发生变更的情形相当普遍,市长平均变更频率为 26.88%。变更最多的年份为 2003 年,发生变更的地级市有 155 个,变更频率达到 41.67%;2007 年官员变更频率也较高,有 150 个地级市市长发生了变更。这与 2002 年和 2007 年政府换届有关。而市长变更频率最低的年份为 2009 年,变更频率也有 14.52%。市委书记也具有类似的分布和变更频率。以上的结果均表明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地方官员处于频繁变更中,政策的不确定性也逐渐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辖区内企业面临的风险。

为了更加直观地描绘官员变更导致的企业风险差异,本文统计了市长变更最频繁的 5 个城市和变更最不频繁的 5 个城市内企业倒闭的概率。统计发现,市长变更最频繁的 5 个城市分别是牡丹江(7 次)、临汾(6 次)、邯郸(6 次)、金昌(5 次)和昭通(5 次),这几个地区企业的平均倒闭概率是 33.40%。官员变更频率最低的 5 个城市的变更次数都为 1 次,本文选取了璧山县、塘沽区、广州、北碚区和贵阳五个地区,发现企业倒闭的概率为 25.71%。市委书记也具有类似的分布。这表明官员变更最频繁的地区企业风险显著高于变更最不频繁的地区。

2. 官员特征描述统计

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市长和市委书记有动力也有能力干预辖区的企业,然而,官员本身是存在差异的。例如,官员年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工作经验等特征存在本质区别,致使官员在任

^① 这里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期内的经济行为与政策决定大多存在显著的差异(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张尔升,2010),由此导致其对辖区内企业存续时间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

图1描述了官员任期分布情况,官员任期定义为官员上任年份到离任时的时间。由图1可知,市长平均任期为3.38年;市委书记平均任期高于市长,为3.77年。此外,官员年龄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直接影响官员在辖区内政策制定和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图2对上任时的年龄进行了统计,在整个样本期内,市长上任年龄介于30.50—60.58岁,平均年龄为47.51岁;市委书记上任年龄介于35.08—59.7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9.61岁。从图中可以看出,官员年龄分布相对集中(45—55岁),这也说明地方官员选拔过程中可能存在年龄方面的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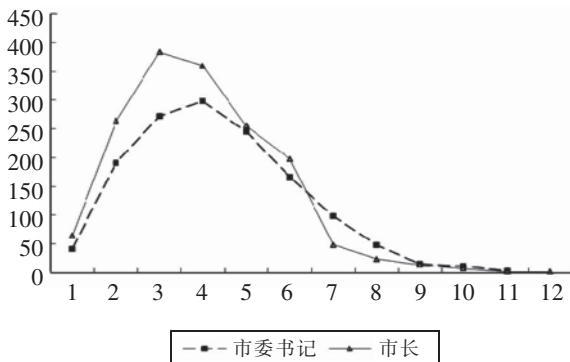


图1 官员任期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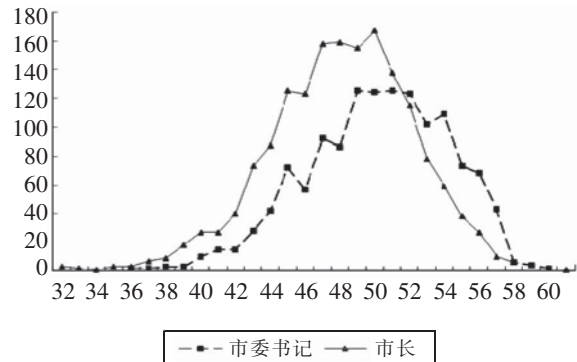


图2 官员年龄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此外,本文对官员学历的分布进行了统计。其中,拥有硕士学历的官员最多,市长达到859人,市委书记为654人;大学本科学历也占相当高的比重(市长402人,市委书记369人);还有294位市长、189位市委书记具有博士学位。因而从学历层次上看,官员的学历结构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中国地方政府的官员选拔中贯彻着精英治理的理念,政府非常关注官员的知识水平。但统计结果也显示,中国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中也存在中学及以下学历的官员(虽然仅有10人),这可能是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

3. 企业生存函数的估计

本文采用企业生存函数和风险函数估计企业生存持续时间的分布特征。令 T 表示企业的存续时间,生存函数 $S_i(t)$ 表示企业 i 的持续时间超过 t 年的概率,如公式(1)所示。生存函数的非参数估计由Kaplan-Meier乘积限估计式给出,如公式(2)所示:

$$S_i(t) = pr(T_i > t) \tag{1}$$

$$\hat{S}(t) = \prod_{k=1}^t (n_k - d_k) / n_k \tag{2}$$

其中, n_k 表示在 k 期处于风险状态的企业数量, d_k 表示同期观测到企业退出数量, $n_k - d_k$ 表示存活的企业数量。将风险函数 $h_i(t)$ 表示为企业在 $t-1$ 期存活的条件下,在 t 期退出的概率,如公式(3)所示,风险函数的非参数估计如公式(4)所示:

$$h_i(t) = pr(t-1 < T_i \leq t \mid T_i > t-1) = \frac{pr(t-1 < T_i \leq t)}{pr(T_i > t-1)} \tag{3}$$

$$\hat{h}(t)=d_t/n_k \quad (4)$$

基于 Kaplan-Meier 乘积限估计式, 本文分别对市长和市委书记发生变更时企业的生存函数及风险函数进行总体估计, 如图 3—图 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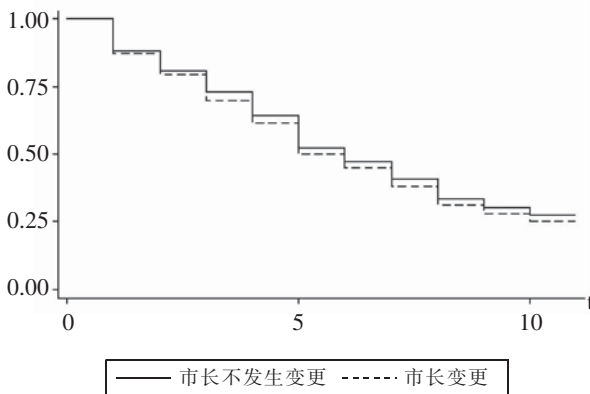


图 3 市长变更的企业生存函数曲线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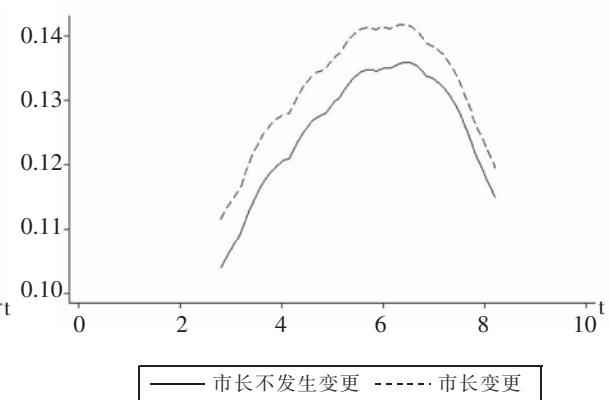


图 4 市长变更的企业风险函数曲线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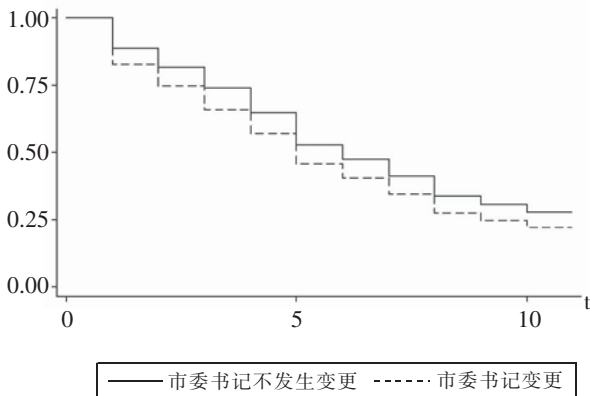


图 5 市委书记变更的企业生存函数曲线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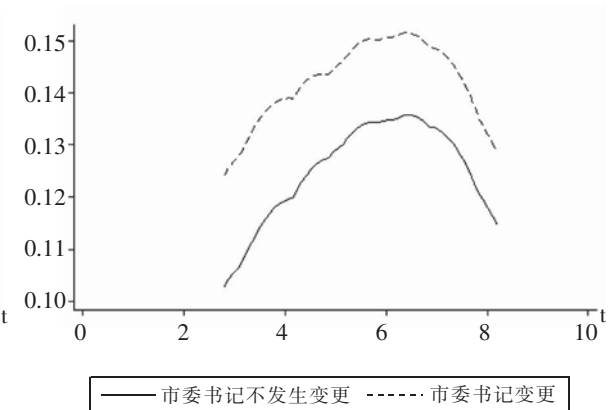


图 6 市委书记变更的企业风险函数曲线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3 和图 5 分别给出了市长和市委书记变更前后企业的生存函数, 从中可以看出, 企业生存函数曲线呈下降趋势, 并随时间逐渐趋于平稳, 且面临官员变更企业(虚线部分)的生存函数曲线位于未面临官员变更企业(实线部分, 图 3 和图 5)的下方, 说明相比未面临官员变更的企业, 面临官员变更企业的生存时间要少。

与此同时, 本文从另一方面刻画企业的生存状况。从图 4 和图 6 的风险函数可知, 企业初创期的风险率较高, 但存活下来的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显著上升。在企业存续时间为 3—6 年之间, 企业的倒闭风险随存续时间呈上升趋势。当企业存续时间超过 6 年后, 企业风险随时间快速下降。相比未面临官员变更的企业而言, 发生官员变更的企业风险函数曲线位于上方(虚线部分), 表明企业面临官员变更的风险比未面临官员变更的要高。

四、模型构建与实证结果

1. 生存分析方法

考虑到企业存灭问题的特殊性,本文采用生存分析模型解决样本期结束时部分研究对象仍未退出而导致的“右删失”问题。将在2009年仍然存活企业的结局变量设定为1,正常退出市场的企业设定为0,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企业的风险函数对企业在未来不同时间点上退出市场的可能性进行预测。生存分析中的解释变量是企业倒闭的风险函数 $h(t, X)$,其中风险向量 X 表示企业在生产过程面临的各种冲击,将风险函数表示为:

$$h(t, X) = h_0(t) \lambda(X_i' \beta) \quad (5)$$

其中, $h_0(t)$ 为基准风险,体现了样本的共性,依赖于时间 t ,但不依赖于 X ; $X_i' = (X_1, X_2, \dots, X_p)$ 为影响企业 i 生存的协变量; $\beta = (\beta_1, \beta_2, \dots, \beta_p)$ 是回归系数; $\lambda(X_i' \beta)$ 代表样本企业的特殊性质,表示每个企业的相对风险,常见的一般形式是:

$$\lambda(X_i' \beta) = \exp(X_i' \beta) = \exp\left(\sum_{k=1}^p X_k \beta_k\right) \quad (6)$$

将公式(6)代入风险函数中得到新的风险函数形式:

$$h(t, X) = h_0(t) \exp(X_i' \beta) = h_0(t) \exp\left(\sum_{k=1}^p X_k \beta_k\right) \quad (7)$$

传统生存分析模型的基准风险具有特定形式,基准风险要么单调递增,要么单调递减,这个性质有时可能与现实不符。解决方法之一就是采用不需要设定基准风险函数形式的Cox比例风险模型,企业 i 和企业 j 的相对风险之比可以写为:

$$\frac{h(t, X)}{h(t, X^*)} = \frac{h_0(t) \exp\left(\sum_{k=1}^p X_k \beta_k\right)}{h_0(t) \exp\left(\sum_{k=1}^p X_k^* \beta_k\right)} = \exp\left[\sum_{k=1}^p \beta_k (X_k - X_k^*)\right] \quad (8)$$

该比值是一个常数,因此当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将 X 表示面临官员变更冲击的企业, X^* 表示未发生官员变更的企业。 $h(t, X)/h(t, X^*) = \exp(\beta)$ 表示面临官员变更的企业相比未面临官员变更企业的风险。 R_j 表示第 j 位企业失效的风险集,Cox比例风险模型的似然估计函数为:

$$\ln L(\beta) = \sum_{i=1}^n [\exp(X_i' \beta) - \sum_{i \in R_j} \exp(X_i' \beta)] \quad (9)$$

2. 计量模型构建

为了考察地方官员变更对辖区内企业生存的影响,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同时考虑企业自身特征及其所有制性质、所属行业以及所处地区等因素,在公式(5)中加入影响企业生存的协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官员是否变更(*Change*),即将官员变更作为区分样本的自然实验来研究辖区内企业的生存状况。新任官员通常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按照钱先航和徐业坤(2014)以及罗党论和余满国(2015)对市级官员任期的定义。本文对官员变更的定义以当年6月为准,官员在当年6月前上任,则当年*Change*取值为1,若发生在6月之后,则在后一年取值为1。

本文控制变量设定如下:①企业生产率(*TFP*)。企业生产率是决定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企业面临的风险也较低。关于生产率的研究多采用LP和OP方法测算。因中间投入数据在本研究中更容易获得,本文采用LP方法计算生产率。预期影响为负。②企业规模(*Scale*)。以员工数目的对数表示(Wagner, 2013),规模较大的企业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具有更强的风险抵御能力(Besedes and Nair-Reichert, 2009; Esteve-Perez et al., 2013)。预期影响为负。③企业年龄

(Age)。以企业当年年份减去建立年份表示。企业在建立初期死亡率通常会较高,但随着企业逐步适应了内外部环境,死亡率会随之降低(Esteve-Perez et al., 2013; Agarwal and Cort, 2002)。预期影响为负。④企业绩效(Profit)。具有较高绩效水平的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较低。本文以企业税前利润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来衡量绩效水平(Tsoukas, 2011)。预期影响为负。⑤技术创新(R&D)。创新作为企业形成核心技术的原动力不断促进企业成长与发展,研发或其他资源的投入越多,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就越显著,生存能力就越强(Fontana and Nesta, 2009)。本文依据 Caldera(2010)的研究,将新产品产值作为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新产品产值大于0时,设定技术创新为1,否则为0。预期影响为负。⑥外资参与(Foreign)。具有更多外资参与的企业通常与外国企业有更多联系,有利于与国外维持稳定的贸易关系(Gorg et al., 2012),从而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越长,这有利于企业承接国外先进的技术,从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延长企业存续时间。⑦政府补贴(Subsidy)。政府补贴增加了企业可用资金,缓解了企业的资金约束,因而降低企业风险。本文引入政府补贴的虚拟变量,如果接受政府补贴,将其设定为1,未补贴取值为0。预期影响为负。本文同时控制地区、行业、年份对生存时间不同影响的问题(Baldwin and Yan, 2011; Du et al., 2012)。

3. 官员变更与企业生存分析

地方官员变更是否增加了当地企业的风险概率? 本文首先运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实证检验官员变更与企业退出风险的关系。在进行 Cox 分析之前需要满足比例风险假设,即不同类别协变量的危险函数是按固定比例变化且不随时间而改变的。本文基于舍恩菲尔德残差的比例风险检验,发现上述假设成立(为了节约篇幅,这里没有列出具体结果,如需备索)。估计结果见表2。

表2中的第2列显示市长变更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官员变更造成的政治环境变化增加了企业退出风险。新任官员上任后,出于对自身能力和晋升激励的考虑,一般会对政策资源进行新一轮的配置。新任官员会重新与当地企业建立关系,重点扶持与自己晋升目标一致的产业,导致上一届政府的针对性产业政策受惠对象在新的形势下遭受风险。尽管名义上市委书记和市长有工作分工,但实际上市委书记不得不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负首要责任,这也是其政绩的核心体现。表2中第3列的结果给出了市委书记变更对企业生存的影响,从中可以发现,市委书记变更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与市长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其中的原因在于,市委书记虽然在多数情况下不直接负责具体经济工作,但对当地事务具有全局性的领导责任,因而对本地企业生存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变更的影响,从表2第4列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当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变更时,当地企业将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此外,控制变量也与预期相一致。

考虑到官员变更可能存在时滞效应,使得变更的作用效果延后才表现出来;另外,在官员变更前,辖区内企业对官员上任后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预期将可能导致企业风险率增加。因此,本文进一步以官员变更作为事件变更的窗口期,将时间分为变更年、变更前后一年和非变更年。在表2中第5列和第6列考察了官员变更的时滞和预期效应对辖区内企业风险概率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市长还是市委书记发生变更,官员变更的当期效应最强,这说明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风险概率影响最大。官员变更对辖区内企业影响的滞后效应也显著为正,但与当期相比,对企业风险的作用有所下降。在官员变更的预期效应中,官员变更前预期到的政策不确定性也增加了企业退出市场的风险,然而与滞后效应和当期效应相比,对企业风险概率的影响较小,表明虽然存着这种政策不确定性预期,但对企业风险概率的影响有限。

此外,为了说明官员变更影响的持续性问题,本文在第7列和第8列中加入官员变更的两期滞后项。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市长还是市委书记发生变更,官员变更当期和变更后一期对企业的生

表2 官员变更与企业风险的实证分析

	基准回归			时滞和预期		持续性	
	市长	市委书记	同时变更	市长	市委书记	市长	市委书记
<i>Change</i>	0.0496*** (12.05)	0.0815*** (17.27)	0.0934*** (11.08)	0.0406*** (6.46)	0.0806*** (11.25)	0.0129*** (3.76)	0.0521*** (8.18)
<i>Change_{t-1}</i>				0.0373*** (6.23)	0.0677*** (9.87)	0.0271*** (8.30)	0.0295*** (5.04)
<i>Change_{t-2}</i>						-0.1480*** (-35.98)	-0.1493*** (-20.61)
<i>Change_{t+1}</i>				0.0100 (1.62)	0.0437*** (6.58)		
<i>TFP</i>	-0.0720*** (-43.28)	-0.0684*** (-41.61)	-0.0706*** (-42.59)	-0.0395*** (-14.91)	-0.0298*** (-11.37)	-0.0573*** (-35.98)	-0.0589*** (-24.99)
<i>Scale</i>	-0.1856*** (-113.80)	-0.1887*** (-116.56)	-0.1893*** (-116.21)	-0.1345*** (-56.92)	-0.1447*** (-61.45)	-0.1415*** (-108.64)	-0.1720*** (-81.72)
<i>Age</i>	-0.0005*** (-7.26)	-0.0005*** (-7.24)	-0.0005*** (-7.16)	-0.1320*** (-91.66)	-0.0386*** (-8.28)	-0.2137*** (-256.14)	-0.0348*** (-7.61)
<i>Profit</i>	0.0114*** (7.02)	0.01129*** (6.56)	0.0124*** (7.61)	0.0221*** (2.90)	0.0261*** (3.51)	0.0274*** (4.47)	0.0234*** (2.80)
<i>R&D</i>	-0.0225*** (-3.49)	-0.0244*** (-3.87)	-0.0285*** (-4.47)	0.0118 (1.36)	0.0098 (1.16)	-0.0192*** (-4.26)	-0.0193*** (-2.56)
<i>Foreign</i>	-0.2395*** (-37.46)	-0.2199*** (-34.90)	-0.2496*** (-38.80)	-0.1557*** (-17.90)	-0.1287*** (-15.01)	-0.0858*** (-21.45)	-0.1726*** (-22.25)
<i>Subsidy</i>	-0.1403*** (-28.47)	-0.1463*** (-29.96)	-0.1405*** (-28.57)	-0.0898*** (-13.60)	-0.1141*** (-17.29)	-0.0896*** (-27.08)	-0.1372*** (-22.94)
Likelihood	-5357731.0	-5416444.5	-5381469.8	-2367215.3	-2401112.9	-5567727.0	-3155688.2
N	725119	732096	736325	400915	405243	457979	463481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z值,***、**、*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并控制地区、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存都产生了负向影响,且变更后一期的系数低于当期的影响。而在官员变更后的第二期,官员变更的估计系数变为负,表明在该时期企业风险受官员变更的影响开始减弱。以上结果表明官员变更的负向影响持续至变更后一期,并随着官员变更时间的延长,这种影响逐渐消退。

4. 不同企业类型在官员发生变更时的差异

考虑到国有企业最终控制人是各级政府,国有企业与地方官员存在紧密的联系,政府官员能够对国有企业施加更多的影响,本文单独抽出国有企业样本检验官员变更在国有企业风险概率中的作用,同时将非国有企业也引入模型进行分析,估计结果见表3。

表3第2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国有企业中,官员变更的估计系数为0.0743,显著高于表2第2列的基准回归中的0.0496,这说明官员变更对国有企业的生存概率的影响程度更大。同时,本文对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也进行了相应分析,表3第3列的结果显示,官员变更的系数为0.0493,表明

表 3 官员变更对不同企业类型企业的风险影响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隶属关系		
			中央	省属	地市
<i>Change</i>	0.0743*** (2.71)	0.0493*** (11.85)	-0.0038 (-0.04)	0.1656*** (2.73)	0.0748** (2.48)
Likelihood	-71402.2	-5245369.1	-6364.0	-10924.7	-52416.9
N	10944	714175	1231	2088	7625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控制了影响企业风险概率的企业层面因素，并控制地区、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官员变更造成的风险对非国有企业也存在影响，但明显低于官员变更对国有企业风险的影响。

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国有企业内的各种层级。因为不同层级的国有企业的谈判能力不同，中央企业的谈判能力要高于其他层级的企业，造成不同层级的国有企业受到官员变更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因此，本文按照国有企业的隶属关系对各层级企业受到官员变更的不同影响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表 3 的后 3 列。从中可以看出，官员变更对中央企业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相比之下，省属企业和地市企业风险因官员变更而增加。这表明官员变更的冲击造成国有企业风险较高更多的体现在省属企业和地市企业，中央企业受到的冲击较低。

5. 官员任期对企业生存的影响

如果说官员变更体现了企业面临官员上任政策的不确定性，那么官员任期就说明了政策的稳定性。在任期方面的研究中，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发现任期与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关系，曹春方等(2014)考察任期和过度投资时，也加入了任期平方项来体现官员任期与企业行为的非线性关系，因此本文在研究官员任期和企业风险概率的关系时，在公式(10)中也加入任期的平方项。模型(11)考察了任期对官员变更与企业风险概率关系的调节作用。

$$Risk_{ijt} = \alpha + \beta Tenure_{jt} + \gamma Tenure_{jt}^2 + \lambda \sum_k Control_{ijt}^k + \varepsilon_{ijt} \quad (10)$$

$$Risk_{ijt} = \alpha + \beta Tenure_{jt} + \gamma Tenure_{jt}^2 + \varphi Change_{jt} + \eta Tenure_{jt} \times Change_{jt} + \mu Tenure_{jt}^2 \times Change_{jt} + \lambda \sum_k Control_{ijt}^k + \varepsilon_{ijt} \quad (11)$$

其中， i 、 j 、 t 分别表示企业、地区、年份； $Risk$ 表示企业风险； $Tenure$ 表示官员任期，以官员离任时间减去上任时间表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的选取和定义依照基准模型进行构建。同时控制地区、行业以及年份固定效应。

表 4 给出了官员任期和企业风险概率的回归结果，表 4 第 2 列和第 5 列的结果显示，官员任期与企业风险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随着官员任期的延长，新上任官员因晋升压力对当地企业的过度干预导致的短视行为也会降低，政策相对稳定，说明相对平稳的政治环境和政策条件是企业持续经营的重要基础。第 3 列和第 6 列中加入官员任期平方项的估计结果显示，任期平方项的系数与企业风险概率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官员任期和企业风险概率之间呈“U”型的非线性关系。第 4 列和第 7 列加入官员变更和官员任期的交互项，考察官员任期对官员变更导致的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概率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 $Tenure \times Change$ 显著为负， $Tenure^2 \times Change$ 显著为正，表明官员变更对企业风险概率的作用受到官员任期的调节。随着任期的增加，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逐渐降低。

表 4 官员任期和企业风险

	市长			市委书记		
<i>Tenure</i>	-0.0232*** (-29.57)	-0.0385*** (-10.25)	-0.0317*** (-7.18)	-0.0119*** (-16.19)	-0.0390*** (-10.83)	-0.0326*** (-8.13)
<i>Tenure</i> ²		0.0013*** (4.18)	0.0007* (1.93)		0.0020*** (7.75)	0.0016*** (5.68)
<i>Change</i>			0.1221*** (5.06)			0.1920*** (5.93)
<i>Tenure</i> × <i>Change</i>			-0.0579*** (-6.01)			-0.0621*** (-5.03)
<i>Tenure</i> ² × <i>Change</i>			0.0067*** (7.54)			0.0065*** (5.92)
Likelihood	-5357406.0	-5357398.1	-5357341.4	-5416454.3	-5416437.8	-5416318.6
N	725119	725119	725119	732096	732096	732096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控制了影响企业风险概率的企业层面因素,并控制地区、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五、机制检验

1. 投资波动率和业务招待费

本文从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腐败行为对官员变更影响企业风险概率的内在机制进行说明。①官员变更产生的政策不连续性导致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这种外部冲击对企业投融资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增加了企业风险。本文从企业投资波动率(*INV_V*)的角度进行说明,用企业 *N* 年投资支出的标准差来衡量(陈艳艳和罗党论,2012)。②腐败程度的衡量。企业在官员变更当年的业务招待费和对外应酬费用是上升的,这一点体现在企业管理费用(*Expense*)支出上,因为企业的管理费用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作为业务招待费出现的。

表 5 给出了官员变更影响企业生存机制的检验结果。第 2 列结果显示,企业投资波动率与企业风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企业波动率增加了企业风险。官员变更与企业投资波动率的交互项为正,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官员变更增加了企业投资波动率,进而提升了企业倒闭风险,验证了官员变更导致政策不连续性的存在。第 3 列中企业管理费用与企业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随着业务费用的增加,企业的风险也将降低。同时,官员变更与企业业务招待费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官员变更后,企业通过增加业务招待费可以降低官员变更导致的部分风险,验证了官员变更腐败行为的存在。

2. 党代会和官员特定年龄

官员变更影响企业生存内在机制的检验还可以从另外两个角度进行说明。①党代会(*Congress*),用来说明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连续性。党代会是指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各级代表大会,本文研究样本年份中 2002 年和 2007 年召开过换届会。党代会换届的年度,地方官员变更的频率会越高。罗党论等(2016)的研究表明,地方官员变更越频繁意味着当地的政治环境越不稳定,企业面临的风险也更大。因此,在分析中加入党代会换届作为政策不确定性的一个刻画。②官员特定年龄限制(*Age59*),用来刻画官员的腐败行为。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特定的年龄限制,

表 5 官员变更影响企业风险的机制检验

	投资波动率	业务招待费	党代会	官员特定年龄	总体
<i>Change</i>	0.0348*** (7.32)	0.0875*** (4.29)	0.0379*** (8.35)	0.2288*** (4.37)	0.2342*** (4.47)
<i>INV_V</i>	0.0002** (2.20)				
<i>INV_V×Change</i>	0.0004 (0.14)				
<i>Expense</i>		-0.0819*** (-54.98)			
<i>Expense×Change</i>		-0.0061** (-1.99)			
<i>Congress×Change</i>			0.1137*** (13.03)		0.1167*** (12.06)
<i>Age59×Change</i>				0.1078** (2.09)	0.1524*** (2.95)
Likelihood	-4037660.4	-5311124.7	-1164306.5	-821876.1	-821811.3
N	601478	720147	110841	126040	126040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控制了影响企业风险概率的企业层面因素,并控制地区、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例如,众所周知的“59岁”现象,是指官员在即将离任时大肆贪污受贿的现象。因此,用该年龄界限可以考察官员上任后的腐败行为对企业生存的影响。

表 5 的最后三列给出了党代会和特定年龄界限对官员的影响。从第 4 列和第 6 列的结果可以看出,党代会和官员变更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显示政策变更幅度越大产生的影响也越大,说明了官员变更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影响。而官员特定年龄则刻画了官员的腐败行为,第 5 列和第 6 列的结果表明,当上任官员年龄在 59 岁时,这种腐败行为给企业造成的风险将增大。

六、进一步分析

1. 官员晋升模式、籍贯来源差异对企业生存的影响

地方官员可能从本地晋升,也可能从外地调任,本文称之为晋升模式。晋升模式的不同,代表着官员个体经历和经验上的差异,也可能包含一种政治激励上的差异(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曹春方等,2014)。本文依据官员晋升模式的不同将新上任官员分为本地晋升(*Local*)、外地晋升(*Other*)和官员平调(*Transfer*)三类,对官员晋升模式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同时令官员在籍贯所在地任职(*Birth*)为 1,否则为 0,来考察官员籍贯差异对企业生存的影响。

表 6 首先在官员变更样本上考察了官员晋升模式在官员变更中的调节作用。第 2 列的结果显示,官员变更由本地晋升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本地晋升降低了官员变更带来的风险冲击。一方面,本地晋升的官员有地方“精英集团”的支持;另一方面,变更后的官员本来就属于该地区领导班子,倾向于延续原有政策,短期内实施新政策的可能性降低,企业因为官员变更带来的风险也较低。官员变更来自外地晋升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说明外地晋升官员在降低官员变更风险冲击中的作用

较弱。这是因为外地晋升官员的资源禀赋相对较差,并且因工作环境的转变,自身治理理念与新地区原有的政策不一致,外地晋升官员推行与前任官员相异政策的可能性较高,引致的企业风险也较大。平调而来的官员在降低官员变更的风险上最显著,平调官员拥有前任地方经济事务管理经验,这种职位的同质性有利于地区政策的开展,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面临的风险。

表 6 官员晋升模式、籍贯来源对企业风险的影响

	晋升模式	籍贯来源			
		整体估计	出生地官员	外地官员	总体
<i>Change</i>		0.0883*** (11.21)	0.0386*** (7.83)	0.0637*** (7.80)	
<i>Local</i>	-0.0335*** (-4.94)				
<i>Other</i>	-0.0157 (-1.47)				
<i>Transfer</i>	-0.1327*** (-7.93)				
<i>Birth</i>		0.0133*** (3.49)			
<i>Birth×Change</i>		-0.0518*** (-5.61)			
<i>L_Change</i>					0.0397*** (8.28)
<i>W_Change</i>					0.0746*** (9.94)
Likelihood	-1163186.1	-5176194	-3556890.5	-1375853.5	-5357725.4
N	110841	705106	492977	212129	725119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控制了影响企业风险概率的企业层面因素,并控制地区、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官员晋升模式体现了资源禀赋的差异,而官员籍贯体现了地缘“关系”的不同(钱先航和徐业坤,2014)。政治家的地缘关联对于当地企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Faccio and Parsley,2009),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关系的社会中,这种同乡地缘关系也会对官员和企业生存产生重要影响。表 6 第 3 列加入籍贯变量和官员变更的交互项,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出生地任职对官员变更导致的企业风险有调节作用。第 4 列和第 5 列的结果显示,当新任官员的籍贯是本地时,当地企业面临的风险也较低。一方面,在出生地任职的官员对该地具有更全面的认识,其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政策取向可能更符合当地的实际;另一方面,当地企业也易于通过地缘关系与出生地任职官员建立联系,加深政府与企业的联系,使企业能够获得相应的政策动向,从而降低地方官员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造成的影响。最后,本文将官员变更由出生地官员任职 (*L_Change*) 和外地官员任职 (*W_Change*) 的两个变量同时引入模型中,结果如表 6 最后一列所示。模型的估计系数表明由出生地任职的官员变更导致的风险要低于外地官员任职导致的风险。

2. 官员个体特征差异对企业生存的影响

不同特征官员的影响力和动机会存在较大差异(李维安和钱先航,2012;钱先航和徐业坤,2014),而这种差异会影响到其相应的政策倾向,从而对辖区内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近年来,在官员晋升中上级越来越注重官员资质的“年轻化、专业化”。为考察官员自身特征差异对辖区内企业生存的影响,本文在该部分引入官员上任时的年龄(*Gage*),以上任时间减去出生时间表示;针对教育水平设定不同教育阶段,引入大学本科(*Bachelor*)、硕士(*Master*)和博士(*Doctor*)学历变量;引入官员留学变量(*Astudy*),将具有留学经历的官员记为1,否则为0。

表7对官员变更样本^①的估计结果表明,官员变更对企业风险概率造成的影响和官员特征差异有关。模型1显示官员上任年龄的系数显著为负,即发生变更官员越年轻,企业风险越大。可能的原因是,相对年轻的官员有更加广阔的晋升前景和预期,因此上任后其政策实施会与前任官员出现较大差异,这种不确定性的政策实施将恶化企业生存环境,降低企业生存概率。在模型2和模型4中引入表示不同教育程度的学历变量,估计结果表明,大学本科和硕士学历能显著降低官员变更时企业倒闭风险,因此适当提升官员的学历水平对降低官员变更时引发的企业风险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但也应看到博士学历的系数虽然为负,但相比本科学历和硕士学历的系数低,且显著性水平不高,这表明官员选拔时也不能一味地追求高学历。从官员留学经历来看,模型3和模型4中留学经历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发生官员变更时,具有留学经历的官员辖区内企业的生存风险将更大。具体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具有留学经历官员的晋升压力相比国内官员要大,政策变动导致的风险也更大;另一方面,该部分官员更多地接受西方国家的经济理念,可能与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可能产生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上与当地现行的政策不协调,从而增加了企业面临的风险概率。

表7 官员个体特征差异对企业风险的影响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i>Gage</i>	-0.0085*** (-11.66)	-0.0090*** (-11.50)	-0.0081*** (-11.04)	-0.0089*** (-11.34)
<i>Bachelor</i>		-0.0667*** (-5.14)		-0.0674*** (-5.20)
<i>Master</i>		-0.1164*** (-9.80)		-0.1181*** (-9.93)
<i>Doctor</i>		-0.0248* (-1.88)		-0.0284** (-2.15)
<i>Astudy</i>			0.0738*** (4.24)	0.0391** (2.18)
Likelihood	-1137460.3	-1165170.7	-1137453.9	-1165169.0
N	108443	108443	108443	108443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控制了影响企业风险概率的企业层面因素,并控制地区、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① 之前主要分析的是官员变更的影响问题,因为官员变更只有变和不变两种状态,侧重考察两种状态下企业生存的差异。同时注意到,官员自身特征可能会对变更引起的企业生存问题产生影响,因而本文选取变更地区的企业“子样本”进行估算。

3. 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对企业生存的影响

企业所在行业特殊性和地区差异可能会使官员变更对企业生存的影响产生差异。一方面,因地理条件、政策措施和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的不同,不同地区企业生存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行业技术水平、发展程度等因素差异也直接导致企业生存状况的差异。因此在研究官员变更对企业生存问题时,应同时考虑官员变更对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影响差异。

表8前4列的结果表明,官员变更对不同地区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别,中部地区受到影响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而西部受到的影响不显著。导致中部地区企业风险较高的原因可能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中部地区本身资源禀赋和企业发展环境相对较差,在面临官员变更时,企业面临的政治环境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企业的生存风险将进一步增大;另一方面,企业自身经营和管理经验不完善,不具备应对政治环境变更引发风险的能力。相比之下,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企业的经营环境和法律体系已比较完善,企业自身的经营和管理经验也相对丰富,因而在面临官员变更时的风险相对较低。本文也注意到西部地区发生官员变更的风险不显著,存在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区本身企业数量就较少,官员变更频率也较低,企业的经营环境相对稳定。

表8 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

	地区差异			行业差异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初级品和劳动密集型行业	中技术行业	高技术行业
Change	0.0412*** (8.22)	0.0975*** (11.72)	-0.0387 (-1.03)	0.0346*** (5.87)	0.0595*** (7.97)	0.0665*** (7.36)
Likelihood	-3726827.7	-1094003.7	-35907.2	-2446995.9	-1528147.3	-951150.4
N	544693	145240	6664	341862	236067	147164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控制了影响企业风险概率的企业层面因素,并控制地区、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此外,本文还考察了官员变更对企业风险影响的行业差异,结果如表8后三列所示。由表8中官员变更的系数可以看出,初级品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受到的影响较低,而高技术以及中技术行业企业受官员变更带来的影响较高。初级品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多为基础行业,具有维持社会稳定和吸纳就业的作用。官员在寻求政治晋升时,稳定就业是一个方面,因此官员变更时,初级品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到的影响也较小。而高技术行业多为新兴产业,受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较大。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于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强大影响力,地方官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辖区内的企业和各种资源,因而地方官员的变更可能会波及到微观层面的企业经营,从而增加了当地企业的倒闭风险。本文将这种影响的机制归为三点:①政策不连续性。地方领导干部调动过于频繁,可能造成当地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致使辖区内企业面临巨大的政策冲击。②官员贪腐行为。新上任官员出于个人晋升需要,会加大对当地企业的干预,这可能与企业发展策略相背离。③政企关系重新洗牌等。官员频繁更换破坏了企业已有的政治关联,可能会加大企业的政治风险。因此在中国特有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制度相结合的体制下,研究官员变更和辖区内企业风险的关系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在中国特定体制下的企业生存状况,为维持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政策指导。

为了估算官员变更引发政治环境变化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本文收集了中国 1999—2009 年 2000 多任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数据,并与辖区内企业匹配来识别地方官员对企业生存的影响。运用 Kaplan-Meier 乘积限估计方法绘制的生存函数和风险函数图显示,官员变更时企业的生存时间更短、倒闭风险更高。在此基础上运用生存分析模型进行更为精确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官员变更会显著增加企业的倒闭风险,并且这一风险存在多期滞后效应,随着时间的延长,影响逐渐消退;但官员变更引致的退出风险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有所差异,其中对国有企业特别是非中央国有企业的风险增加尤为明显;任期的稳定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并且任期对官员变更导致的风险有调节作用。除此之外,本文还特别关注了官员自身特征对官员变更引致风险的影响,发现本地晋升的官员、在出生地任职的官员、学历水平较高的官员引致的企业倒闭风险较低。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结论表明官员变更引发的政治环境变化增加了辖区内企业退出风险,同时这种作用会因为官员任期、晋升模式、籍贯来源以及官员自身特征不同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结论对理解政治环境与企业生存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对完善地方官员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的政策建议直接蕴含在估计结果之中:

(1)保持官员任期的相对稳定。本文的估计结果显示,官员变更导致的企业风险将增加,而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企业面临的风险将逐渐降低,并且官员任期在官员变更上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因此,实行合理的任期制度,避免官员的频繁更替,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将有利于降低微观经济主体面临的风险,从而维护地方经济的正常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2)从晋升官员的来源和籍贯来看,由本地晋升以及在出生地任职的官员引发的企业经营风险较低,而外地晋升以及非出生地任职官员带来的风险较大,这说明官员对地方经济的熟悉程度和爱护程度对辖区内企业的生存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对地方官员进行“空降”虽然具有外地经验和避免权力固化等优势,但也有不熟悉当地经济等弊端。同时,本文也注意到平调官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官员变更风险,说明已有任职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注重本地官员任职和晋升的同时加强官员之间的平行交流(而不是异地擢升)也有利于提升官员的治理效率。

(3)在加强官员的知识化和年轻化建设的同时,也要注重完善晋升的考察指标。本文的估计结果显示,提拔具有更高知识水平(本科和硕士)的官员,将有利于降低企业因官员变更导致的风险概率。当然,也不需要盲目地追求高学历,因为本文的估计结果还显示,博士学位在降低官员变更风险问题上的作用较小。另外,当前中国正在进行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建设,但在选拔年轻干部时需要注意的是,年轻官员追求晋升的动力更强,但经验相对不足,因而年轻官员谋求晋升以及缺乏治理经验将增大辖区内企业的风险,这就要求对官员的选拔要有更加科学的指标。一味地以地区 GDP 作为官员晋升的考核标准,可能会引发地方官员为晋升而出现严重的短视行为,造成对地方企业过度干预,反而不利于企业长远的生存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曹春方. 政治权利转移与公司投资: 中国的逻辑[J]. 管理世界, 2013,(1):143-156.
- [2]曹春方,傅超. 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捐赠: 官员会追求“慈善”吗[J]. 财经研究, 2015,(4):122-133.
- [3]曹春方,马连福,沈小秀. 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J]. 经济学(季刊), 2014,(4):1415-1436.
- [4]陈艳艳,罗党论. 地方官员更替与企业投资[J]. 经济研究, 2012,(2):18-30.
- [5]戴园晨. 迂回曲折的民营经济发展之路——红帽子企业[J]. 南方经济, 2005,(7):26-34.
- [6]邓子梁,陈岩. 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生存的影响: 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研究[J]. 世界经济, 2013,(12):53-69.

- [7]干春晖,邹俊,王健. 地方官员任期、企业资源获取与产能过剩[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3):44-56.
- [8]贾倩,孔祥,孙峥. 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省级地方官员变更的实证检验[J]. 财经研究, 2013(2):81-91.
- [9]李维安,钱先航. 地方官员治理与城市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J]. 经济学(季刊), 2012,(4):1239-1260.
- [10]罗党论,廖俊平,王珏. 地方官员变更与企业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 2016,(5):130-142.
- [11]罗党论,余满国. 地方官员变更与地方债发行[J]. 经济研究, 2015,(6):131-146.
- [12]罗党论,应千伟. 政企关系、官员视察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 南开管理评论, 2012,(5):74-83.
- [13]潘越,宁博,肖金利. 地方政治权利转移与政企关系重建——来自地方官员更替与高管变更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6):135-147.
- [14]钱先航,曹延求,李维安. 官员任期与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J]. 经济研究, 2011,(12):72-85.
- [15]钱先航,徐业坤. 官员更替,政治身份与民营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J]. 经济学(季刊), 2014,(4):1437-1460.
- [16]乔坤元. 我国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 理论与证据[J]. 经济科学, 2013,(1):88-98.
- [17]宋凌云,王贤彬,徐现祥. 地方官员引领产业结构变动[J]. 经济学(季刊), 2013,(1):71-92.
- [18]王贤彬,徐现祥. 地方官员来源、去向、任期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市委书记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08,(3):16-26.
- [19]吴海民. 市场关系,交易成本与实体企业“第四利润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3,(4):107-119.
- [20]肖兴志,何文韬,郭晓丹. 能力积累、扩张行为与企业持续生存时间[J]. 管理世界, 2014,(2):77-89.
- [21]徐现祥,王贤彬,舒元. 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07,(9):18-31.
- [22]徐业坤,钱先航,李维安. 政治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3,(5):116-130.
- [23]杨海生,陈少凌,罗党论,余国满. 政策不稳定性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地方官员变更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2014,(2):13-28.
- [24]杨其静. 分权、增长与不公平[J]. 世界经济, 2010,(4):102-120.
- [25]杨瑞龙,王元,聂辉华. “准官员”的晋升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3,(3):23-33.
- [26]姚金伟. 扶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J]. 财经问题研究, 2014,(2):3-10.
- [27]于娇,逯宇铎,刘海洋. 出口行为与企业生存概率:一个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 2015,(4):25-49.
- [28]张尔升. 地方官员的企业背景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委市委书记,省长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10,(3):129-138.
- [29]张平,赵国昌,罗知. 中央官员来源于地方经济增长[J]. 经济学(季刊), 2012,(1):613-634.
- [30]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 2007,(7):36-50.
- [31]Agarwal, R., and M. Gort. Firm and Product Life Cycles and Firm Survival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2,92(2):184-190.
- [32]Baldwin, J., and B. Yan. The Death of Canadian Manufacturing Plants: Heterogeneous Responses to Changes in Tariffs and Real Exchange Rates[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1,147(1):131-167.
- [33]Besedes, T., and Nair-Reichaert. Firm Heterogeneity,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Duration of Trade and Production; the Case of India[R]. Working Paper, 2009.
- [34]Brandt, J., V. Biesebroeck, and Y. Zhang.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97(2):339-351.
- [35]Caldera, A. Innovation and Exporting: Evidence from Spanish Manufacturing Firms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0,146(4):657-689.
- [36]Du, J., Y. Lu, Z. Tao, and L. Yu. Do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orters Differ in Learning by Exporting?

- 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23(2):296–315.
- [37]Esteve–Perez, S., P. L. Vicente, and R. S. Fancisco. The Duration of Firm–Destination Export Relationships: Evidence from Spain, 1997–2006[J]. *Economic Inquiry*, 2013,1(51):159–180.
- [38]Faccio, M., and D. C. Parsley. Sudden Deaths: Taking Stock of Geographic Ti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09,44(3):683–718.
- [39]Fontana, R., and L. Nesta. Product Innovation and Survival in a High–Tech Industry [J].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09,34(6):287–306.
- [40]Gorg, H., R. Kneller, and B. Murakozy. What Makes A Successful Exporter? Evidence from Firm–Product–Level Data[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 Economique*, 2012,4(45):1332–1368.
- [41]Julio, B., and Y. Yook.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Cycles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2,67(1):45–83.
- [42]Namini J. E., G. Facchini, and R. A. López. Export Growth and Firm Survival [J]. *Economics Letters*, 2013, 120(3):481–486.
- [43]Shleifer, A., and R. W. Vishny. *The Grabbing Hand: Government Pathologies and Their Cures*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44]Tsoukas, S. Firm Survival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Emerging Asian Economies [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11,35(7):1736–1752.
- [45]Wagner, J. Exports, Imports and Firm Survival: First Evidence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Germany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3,1(149):113–130.

Official Turnover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Local Enterprises——An Evidence from China’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LIU Hai–yang¹, LIN Ling–tao¹, HUANG Shun–wu²

(1.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of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of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great influence of local government on the economy, official turnover may affect some local enterprise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 mechanisms included policy discontinuity, corrupt behavior and reconstruc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his paper collected the data of more than 2000 mayors and secretaries from 1999 to 2009 in China, and matched with the enterprises to identify the official’s influence on survival of enterprises. The survival function and the risk function diagram drawn by using the Kaplan–Meier method shows that survival time of enterprise facing official change is shorter and risk is higher. The paper using survival analysis model found that official turnover increased the enterprise exit risk and had multiple hysteresis effect. The exit risk caused by the official turnover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ownership enterprises,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specially the risk of non cent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creased obviously. The term stability helps reduce business risk. The paper by further controlling the officials of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found that the risk caused by local promotion officials, higher education officials or taking office in birthplace official is low. This study provides a basis for decision making on how to reduce the risk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official, meanwhile provides a useful policy implication for the scientific establishment of the official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system.

Key Words: official turnover; enterprises; survival analysis

JEL Classification: D81 H11 M12

[责任编辑:王燕梅]